

欧美身份政治的历史演进与治理困境*

王 军 黄 鹏

身份政治是理解欧美国家民族问题的重要切入口。虽然欧美学界对身份政治的内涵和起点有一些争议,但他们均比较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起起落落的身分政治现象。从民族问题的角度考察,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身份政治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彰显的是少数人问题,突出表现为种族与移民问题,第三阶段则突显为多数人身份政治问题,其特点是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糅合。欧美身份政治是一场多主体复合博弈,牵涉国家与社会关系,各种诸意识形态竞争,政党政治博弈,不同身份群体竞争等;欧美国家身份政治演进过程包含了复杂的思想动力与叙事博弈,左翼思想、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均涉入其间,进而呈现出身份解放政治、身份承认政治、身份容纳政治、身份对决政治等线索与生态,亦折射出身份政治治理的不同脉络与张力。身份政治对欧美国家政治变迁具有双重作用,但近期的发展业已构成西方治理危机的重要构成部分,必须从理论和国家治理层面加以回应。

关键词:身份政治 左翼 新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话语

作者王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黄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当国内学界近年热烈研讨中国百年变局或“千年未有之变局”之际,欧美学界则日益惊呼当下全球(西方)秩序大变局。毋庸置疑,前者洋溢着程度不一的乐观基调,后者散发出浓烈的悲观寒意。中外变局之研讨背后,不乏共同的问题意识,身份政治无疑位列其间。从欧美国家^①角度说,新一波身份政治的崛起不仅具有事件性,而且具有趋势性。身份政治作为一个复合型议题,是我们理解西方民主和民族问题的一把关键钥匙,日益为中外学界所关注,亦在近年进入新的研讨高峰。^②之所以视身份政治之为观察欧美国家民主运行的关键视角,首先是

*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41)、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美国白人劳工阶级崛起的机理、动因与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0YJCZH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所说的欧美国家主要是指欧洲与北美地区的西方国家。从事件的角度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欧美右翼保守主义崛起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均包含有浓厚的身份政治要素。通过复杂传导机制,这两个事件还刺激或衍生了一系列关联事件。从趋势的角度说,身份政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能与诸多意识形态混杂糅契合的思潮。

② 有学者认为,西方身份政治讨论在2017年达到高峰,参见Ashok Kumar, Adam Elliott-Cooper, Shruti Iyer and Dalia Gebri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y Pol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6, No. 2, 2018。

因为不同类型的身份政治深深嵌入欧美国家,并在民主制度层面引发有利于或不利于民主等诸多针锋相对的争议;其次是因为欧美国家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少数族裔问题,甚至新一轮白人民粹民族主义崛起问题均与某种身份政治相关联。本文聚焦于身份政治与民族问题之交叉部分,从四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分析欧美国家身份政治起源与内涵问题,随后探讨该身份政治变迁的历史脉络,其后重点从政治思潮角度讨论欧美身份政治变迁,最后对其做出评价。

一、欧美国家身份政治的起源与内涵

至少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作为学术概念的身份政治已被一些学者采用,该术语随之被追溯性地应用于其出现之前的各种运动。不过,由于学界对身份政治核心内涵的认知不同,间接影响了对身份政治运动何时发端的判断。

(一) 欧美身份政治的起源

关于欧美身份政治起源,学界至少存在四种观点。其一为身份政治“300 年说”。艾森伯格(Avigail Eisenberg)与金里卡(Will Kymlicka)认为,过去三十年被描述为身份政治的时代,身份群体政治化和动员比比皆是,即主要沿着性别、种族、语言、族群性、原住民、宗教等身份而展开。但身份政治并不是新的政治现象,而是可以追溯到之前的 300 年间,如荷兰的宗教群体竞争,比利时的语言群体竞争,美国的黑人白人群体竞争,加拿大等地欧洲殖民者与土著人群体的竞争等。^① 其二为身份政治“19 世纪起源说”。琳达·马丁·阿尔科夫(Linda Martin Alcoff)与塞塔伊·默罕迪(Satya Mohanty)认为,西方社会中的身份政治,即以身份为基础的旨在实现政治自由的社会运动,并不是新的政治现象,它至少可追溯至 19 世纪,如美国的废奴运动、基于身份的选举权运动等。^② 其三为身份政治“20 世纪下半叶起源说”。它在学界最为流行,格兰特·法瑞(Grant Farred)在追溯身份政治的左翼根源时,将其定位于肇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英美一系列政治运动;^③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身份政治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因为身份政治的显著形式——族性(ethnicity)——是随着格拉泽(Glazer)和莫伊尼汉(Moynihan)1963 年出版的《熔炉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首次进入进入公众视野。^④ 其四为身份政治起源于 20 世纪晚期说。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身份政治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以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方式出现的。^⑤

学术史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已涌现两波研究热潮。第一波热潮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世纪之末,主要聚焦于民权运动以来的身份政治活动,彼时的论争多集中于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的

^① 参见 Avigail Eisenberg and Will Kymlicka, “Bringing Institutions Back In: How Public Institutions Assess Identity,” in Avigail Eisenberg and Will Kymlicka, eds.,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Public Realm*, Vancouver: UBC Press, 2011, p. 1.

^② 参见 Linda Martin Alcoff and Satya P. Mohanty, “Reconsidering Identity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Linda Martin Alcoff, Michael Hames-Garcia, Satya P. Mohanty and Paula M. L. Moya, eds., *Identity Politics Reconsider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8.

^③ 参见 Grant Farred, “Endgame Identity? Mapping the New Left Roots of Identity Poli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1, No. 4, 2000.

^④ 参见[英]霍布斯鲍姆著、易晖译:《身份政治与左派》,《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⑤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 9.

探究。^① 2008年之后,欧美学界对身份政治的研究到达一个新的高峰期。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阴影的双重笼罩下,欧美国家出现了逆身份政治的声音,并与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发生了正面交锋,此时对身份政治的负面评价也明显增多。^②

(二) 欧美身份政治的内涵

身份政治是一个关涉甚广的概念。首先,它跨越了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诸多学科,并与左翼思想、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有着复杂的勾连。其次,身份政治涉及议题广泛,族裔政治、性别政治、性取向政治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关于身份政治的内涵,大体可分为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类。狭义身份政治说,聚焦于具有特定特质的群体的身份政治,它至少衍生出了四种次级类型。第一类是将身份政治化约为弱势被剥夺的少数人的身份政治。也就是说,身份政治的主体是权力意义上的少数人(minority),它们属于被剥夺群体、权力弱势群体、追求公正和承认,他们属于非数量意义上的少数人。^③ 第二类是将身份政治的主体视为文化群体,因此身份政治的实质是文化政治化。即在排除个体公民身份、阶级身份的前提下,还要排除包含政治属性的国内民族身份(nations within state),而将群体身份集中在性别、宗教、语言、种族、移民族群等文化身份上。这一界定在研究议程上带来了一个麻烦,即排除了土著人身份政治和国内世居民族的身份政治。第三类是将身份政治化约为身份排他政治。霍布斯鲍姆在谈及“排他性的身份政治”假定时说,“在我们拥有的多重身份中,有一种决定着,或者至少主导着我们的政治: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那就做个女人;如果你是个安特里姆郡(Antrim)的统一派,那就做个新教徒;如果你是个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那你就做个加泰罗尼亚人;如果你参与同性恋运动,那就做个同性恋者”。^④ 排他性身份政治的极致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批评的身份单一主义。^⑤ 第四类是将福山将身份政治定义为追求平等尊严(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等级尊严)的群体政治。^⑥

身份政治光谱五彩斑斓,它在内容与主体上也充满了弹性。若仔细审视,广义层面的身份政治仍有其限定性条件。在身份主体上,广义身份政治说持宽松立场,将身份政治视为政治体系与进程中不同于个体公民、不同于阶级身份的“横向群体身份政治”现象,多数人、少数人均可是身份政治的主体;在政治立场上,广义身份政治说建立在声张独特性、挑战压迫性、寻求自

① 代表性著述参见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Kimberle Crenshaw,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3, No. 6, 1991; Eric Hobsbaw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Vol. 217, 1996.

② 代表性著作参见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7;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Ashok Kumar, Adam Elliott—Cooper, Shruti Iyer and Dalia Gebri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y Pol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6, No. 2, 2018; 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UK & New York,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有人甚至使用“disability studies”来形容该群体的研究。参见 Tobier Siebers, "Disability Studies and the Future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Linda Martin Alcoff, Michael Hames—Garcia, Satya P. Mohanty and Paula M. L. Moya, eds., *Identity Politics Reconsidered*,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6, p. 10.

④ [英]霍布斯鲍姆著、易晖译:《身份政治与左派》,《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⑤ 参见[印度]阿玛蒂亚·森著,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身份与暴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⑥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2018, Preface xiii.

主性的基础之上,涵盖了承认政治、差异政治、社群主义等核心概念。

学界一般关注身份政治的二维存在:一是不同身份主体基于利益、尊严而推动的各类身份运动,二是不同政治思潮围绕各类身份政治议题的主张与辩论。笔者以为,学界较为忽略身份政治的治理维度,即公共事务层面就身份政治议题所展开的辩论、协商与斗争。

二、欧美身份政治演进的历史过程

在过去六十年间,欧美国家身份政治起起落落,它沿着多个线索演进,并与不同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发展趋势相缠绕、相勾连。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级段,下文仅对其演进作概要性勾勒。

(一)20世纪60—70年代:种族问题在欧美身份政治中突显

二战结束后美国兴起了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一方面,它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应,即对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权主义及其关联的大众社会进行批评反思,学界担忧美国可能出现类似趋势。另一方面,该议题兴起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即美国个体主义盛行,容易导致社会团结缺失和个体孤独,进而刺激美国社会发现大众社会。大众社会研究及其批判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而身份意识、归属感等是理解这一对关系的关键性概念。^①“春江水暖鸭先知”,身份议题的抬头还不是显性的身份政治勃兴,但它预示着自觉且高浓度的身份政治即将走上政治舞台。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身份政治包含多个线索: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及对少数种族的承认(印第安人和拉美裔人等)、美国欧洲裔群体的“族群复兴”,在西欧则是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②以上涉及几种内涵不一的身份政治与身份政治群体。从主体角度说,黑人民权运动主要涉及黑白种族(race)群体权益问题,美国欧洲裔群体“族群”复兴属于某类移民与移民后代(ethnic groups)权益问题,欧洲地方民族主义复兴则涉及一国内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权利问题,另外还有原住民(aboriginals)权益问题。这些不同的族类群体,属于广义民族研究范畴,他们既反对国家建构过程中社会文化同质化(同化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还在具体时空下提出了各类权益诉求,且各自援引的理由差别甚大,其中最为突出、影响力最胜的莫过黑人民权运动了。

在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民权运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掀起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运动,该权利运动既包含个体公民权、群体的集体权利,同时深受全球民主化进程和左翼思潮的影响。从后者的角度说,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革命的时代,左翼所倡导的平等政治、解放政治越过了阶级的范畴,推动了欧美国家身份政治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政治成为黑人斗争的武器。一方面,黑人身份被自信地加以表达,且具有政治意义。黑人获得了自信的文化表达,“黑即是美”(black is beautiful),“我是如此美丽”(I'm so pretty,拳王阿里之宣称)等说法在黑人

^① 参见 Philip Gleason, “Identifying Identity: A Semant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9, No. 4, 1983.

^② 参见[比利时]马可·马尔蒂尼埃罗著,尹明明、王鸣凤译:《多元文化与民主:公民身份、多样性与社会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群体中可谓脍炙人口、流播深远。黑人运动员与艺术家在公共空间里表达自我或自我定义的权利具有政治性,这不同于以前的意象,此前此类表达被认为是非政治的,或者社会常常对此种表达持有敌意。^①另一方面,黑人民权运动挖掘了黑人身份的冤屈性、被剥夺性和压迫性,并要求补偿或赔偿,例如,针对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发动了赔偿运动(主要为了赔偿黑奴后代),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该议题迁延至今。^②20世纪70年代,“个体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口号高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等新兴政治力量均被纳入身份政治旗帜下,族群问题、性别问题和性取向问题成为身份政治中三大核心议题。^③

在黑人民权运动压力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回应性措施,以解决黑人公民权缺失问题,并承认弱势的少数人拥有部分集体权利(主要通过平权行动加以实施)。英国也在黑人民权运动背景下采取行动缓和种族问题。1965年和1968年,英国工党政府相继颁布了两部种族关系法,制止公共领域的种族歧视,其后1976年出台了影响至今的《种族关系法》。^④

(二)20世纪80—90年代:移民问题在欧美身份政治中崛起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欧美种族问题上所引发的身份政治运动逐渐进入低潮。一方面,这是由于工会与诸多身份群体的斗争联盟逐渐解体,该身份政治运行中的解放动力熄火。^⑤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在种族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出新的公共政策,其种族矛盾有所缓解,该议题上的身份政治运动从街头转向在大学校园中加以展开。

“按下葫芦浮起瓢”。种族问题缓和之际,移民问题引发的身份政治开始崛起。移民本是一种古老的现象,但它成为公共政策中突出的议题则比较晚近了。到20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认为外来移民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即旨在弥补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不久后他们将返回自己的祖国,德国人将外来移民劳工称为“客工”,“客”当然意味着他们不是本国的主人。但事与愿违,外来劳工并没有出现回国潮。外来移民及其后代的公民权问题、群体融入与适应问题随后成为西欧国家比较突出的政治社会问题,进而衍生出欧美国家身份政治中特别突出的一种类型,即通过政治运动和其他政治行动寻求移民裔文化的保护,以及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寻求相关权益。这一时期,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欧美国家在移民(及其后代)群体管理政策上出现了同化主义^⑥到多元文化政策的演进。但各国多元文化政策有一些差异。譬如,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依托伞形组织,赋予城市移民少数民族以一定的参与平台与集体权利。德国则对移民入籍持严厉政策,但在移民文化保持上较为宽松,即允许移民群体平行社会出现。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由于欧美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优势,移民呈现加速

^① 参见 Grant Farred, “Endgame Identity? Mapping the New Left Roots of Identity Poli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1, No. 4.

^② 2019年1月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李(Sheila Jackson Lee)提出议案,要求美国向奴隶后代做出经济赔偿,引发激烈争议,而议案的支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党议员。该议案的原文参见 <https://www.congress.gov/bills/116/congress/house-bills/40/text>。

^③ 参见 Gurminder K. Bhambra & Victoria Margree,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Need for a ‘Tomorrow’,”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5, No. 15, 2010。本文主要研究身份政治与广义民族问题相交叉的部分,对女性等身份政治不做讨论。

^④ 参见韦平:《多元文化主义在英国的成与“败”》,《世界民族》2016年第3期。

^⑤ 英国学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指出,英美新自由主义对西方产业无产阶级提出巨大挑战,工业无产阶级在1980年代不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它被更加无定形的主体所取代。参见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2015。

^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美国家大体上对移民群体采取同化政策。

涌入之势,该群体所诱发的身份政治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2000—2020年:多数人身份政治崛起与身份政治的复合演进

21世纪初期20年间,欧美身份政治出现了新变化。少数人的身份政治仍在推进,但新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作为多数人的白人身份政治崛起,该身份政治兼有民粹民族主义的特性,它与前文所说的不同进路的身分政治存在互动关系。概要性地梳理这二十年欧美身份政治的脉络,可从若干重大事件中找到变迁的蛛丝马迹与转化拐点。

第一个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及随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美国反恐战略某种程度上立基于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它在国内政治上立基于亨廷顿的身份政治担忧假设。亨廷顿认为,大量新移民(特别是拉美裔移民)在接受“美国人”身份的同时,并未放弃对自己原生文化的认同,美国传统的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受到了挑战。长此以往,美国的传统国家特性将丧失殆尽,“国将不国”。^①而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轮回冲突引发并加剧了欧美国家“伊斯兰恐惧症”,这加剧了多数人身份政治与少数人(穆斯林移民)身份政治直接对抗。

第二个事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它加剧了美国底层白人的生存困境,恶化了美国白人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这意味着多数人尊严渐渐失去),激化了白人民粹主义者积累已久的愤怒。尊严与愤怒,恰恰是福山定义中的身份政治的内核。马克·里拉(Mark Lilla)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之一是美国右翼获得了更大的叙事空间,譬如右翼煽动家格伦·贝克(Glenn Beck)影响力剧增,他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每日广播中,揭示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和奥巴马之间隐藏的联系;他在自己的书中批评布什总统的经济和边境政策背离建国原则,批评美国的国际主义。他是第一批报道美国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其子女的前途大大受损这一事实的右翼人士之一,其经济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引起了诸多公众的共鸣。^②

第三个事件是2010年前后欧洲多国政府首脑宣布其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2010年至2011年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先后发表讲话,宣布各自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失败。欧洲境内频发的恐怖主义事件以及政府首脑对多元文化政策的负面评价,导致欧洲移民的身份政治叙事遭遇主流社会更多的反思、质疑和担忧。与政界的政策失败论相呼应的是学界此前类似的观点,如英国学者贝特·叶奥(Bat Ye'or)2005年出版了《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一书,^③使“欧拉伯”(Eurabia)一词成为欧美政治中一个重要概念。该词由“欧洲”(Europe)和“阿拉伯”(Arabia)两个单词组合而成,体现的是主流社会的身份担忧,即害怕大量阿拉伯移民欧洲使原有白人失去自我。这一波学政合力叙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对移民权与移民身份政治的反思,也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多数人身份政治思潮,乃至出现不少极端行动。^④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277页。

^② 参见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7, p. 51.

^③ 参见Bat Ye'or, *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 Lanham: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在欧洲出现了“阻止欧洲阿拉伯化”(Stop Islamisation of Europe),在美国还现了“阻止美国阿拉伯化”组织(Stop Islamization of America)的极端组织。参见<https://www.adl.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ssets/pdf/civil-rights/stop-islamization-of-america-2013-1-11-v1.pdf>。

第四个事件是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2015—2017年,向欧洲32国提出避难申请的难民人数分别是132.6万、123.6万、67.6万。^①大量难民的涌入,带来了复杂的政治社会后果。在身份政治层面,它诱发了东西欧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的裂缝,加剧了欧洲民众对难民移民的负面感知。皮尤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欧洲民众对难民的负面看法、对穆斯林族群的负面看法与恐怖主义的看法联系起来,波兰、希腊、匈牙利等国高比例受访者认为难民是一个威胁,^②这无疑为整体上本已日渐高涨的欧洲白人民粹主义添加了新的佐料。^③

有了前述事件及其社会(心理)结构做铺垫,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两大饱含多数人身份政治意涵的黑天鹅事件也可谓顺理成章了。综合来看,近年欧美新一轮身份政治之崛起,突出表现在多数人身份政治与稳定的少数人身份政治之互动与对抗,它内嵌于欧美选举政治进程,外显于法国黄背心运动、美国罗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将军雕像被拆除之类街头政治抗议,弥散于原有平权政策和各类相关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之中。

三、政治思潮与欧美身份政治演进

欧美国家身份政治演进的线索多样,其演进动力也是多元的,下文侧重从政治思潮角度加以阐释,重点考察左翼解放政治、社群主义承认政治、新自由主义容纳政治、右翼保守主义民粹政治是如何卷入与阐释身份政治的。

(一)身份—解放政治:左翼思想对少数人身份政治的影响及其叙事

1. 左翼思想涉入少数人身份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欧美身份政治崛起过程中重要的思想动力,但它在接下来两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却黯然失色,令左翼思想家颇为失望。美国政治近年出现了“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与“反动的民粹主义”之间日益尖锐的对决,这彰显了美国左派在社会运动、思想阐释、政党政治等方面面临的尴尬与困境。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如是论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经久不衰的左派,也没有任何全面的左派理论可以一方面批判经济金融化,另一方面也拥有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和反等级制的解放政治,以此来阐明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正当不满。同样致命的是,劳动者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潜在联系日益微弱。若割裂两者的关系,那些对于一个可行的左派来说不可或缺的两极便愈行愈远,甚至互为反题,彼此对立。”^④

在政党政治层面,近年来的亮点来自英国工党以及美国民主党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左翼思想与身份政治的部分融合。英国工党的某些政治主张融合了社会主义与身份政治考量,如它与苏格兰民族党一度合作,且支持地方放权,这是苏格兰地方议会成立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高举“民主社会主义大旗”,一度在2015年选举中显现了某些希望,他基于身份政治又力图超越身份政治,尝试将劳工与新社会运动结合

① 参见宋全成、温婧:《欧洲为何泛起排斥穆斯林族群的思潮?》,《西亚非洲》2019年第5期。

② 参见Jacob Poushter, “European Opinions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 5 Charts, September 16,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16/european-opinions-of-the-refugee-crisis-in-5-charts/>。

③ 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发展变化的具体数据参见Ray Dalio, *The Developed World Populism Index*, March 26, 2017, <http://time-price-research-astrofin.blogspot.com/2017/03/the-developed-world-populism-index-ray.html>。

④ 参见[美]南茜·弗雷泽:《进步的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 [美]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孙柏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6—77页。

起来,但他并未击败民主党主流候选人希拉里。2020年美国选举进程中,桑德斯卷土重来,一度在一些州竞选中获胜,为一些人看好,但最终仍败于民主党主流候选人拜登(Joe Biden)。

虽然在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方面表现不佳,但左翼思想从阶级政治角度对身份政治进行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没有停止,并在20世纪90年代与近年形成了两个小高峰。20世纪90年代,霍纳特(Axel Honneth)、南希·弗雷泽等左翼作家发表了重要的有关身份政治的文献,并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社群主义思想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展开辩论,他们内部也形成了关于承认与再分配的辩论,^①2017年以来,鉴于欧美身份政治的新局面,左翼思想家又频频发声。盖瑟尔伯格(Heinrich Geiselberger)主编的《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汇集了全球15名作者,对新自由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的内核以及所引发的危机做了充分的揭示和批评,左翼立场明显。^②左翼杂志《历史唯物主义》于2018年第2期推出了身份政治专题,在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等作者看来:资产阶级利用身份政治瓦解了一切群众性的、反资本主义的团结和抵抗的基础——此种策略的逻辑在于,经济剥夺的根源不在于资本结构,而在于资源不公平地被移民、有色人种和同性恋者所浪费——反对这种经济掠夺不需要肢解资本主义,而是需要通过种族和性别斗争来实现。为此,库马尔等人旨在消除“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之间的人为对立,希望左翼思想家不要满足于或沉迷于新自由主义对身份政治的容纳(不能将身份政治只是视为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延伸),而是提倡重构左翼身份政治范式,或者说回归身份政治作为反对资本主义政治形态之一的立场。^③

2. 左翼思想的优势及其面临的挑战。左翼思想与身份政治在不同时空下的结合有不同的背景,其结合进程中的优势和不足也甚为明显。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左翼思想追求公正与正义、反对剥削与压迫的思想和叙事,为族群政治与女性政治提供了直接的切入点和部分合法性。与此同时,阶级政治的推进也需要某些身份政治群体作为同盟军。因此两者结盟不乏社会基础和操作空间,也不乏经典案例。譬如,黑人民族主义和激进左翼组织黑豹党在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崛起就是一个标志性案例,它起初推动了美国黑人的身份政治,同时也彰显了左翼的力量,但该组织随后日益激进,被美国政府打击并于80年代初难以为继而解散。左翼思想也推进了女性身份政治崛起。左翼思想在揭示历史与现实中弱势群体的地位方面深刻且擅长。他们发现,女人或弱势族裔成员,特别容易遭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伤害、暴力、剥削、边缘化。1977年,黑人女权主义的重要文献《康比河公社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在此方面做了典范性表达,并在文献中首次使用了身份政治一词。^④马克·里拉(Mark Lilla)也指出,左派的身份认同政治首先是有关民众中的庞大阶级——黑人、女性——通过动员民众意识到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冤屈,并试图纠正,接着通过政治机构的工作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⑤

① 参见[美]凯文·奥尔森主编、高静宇译:《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参见[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孙柏等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③ 参见 Ashok Kumar, Adam Elliott—Cooper, Shruti Iyer and Dalia Gebri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y Pol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6, No. 2, 2018。

④ 相关分析参见 Grant Farred, “Endgame Identity? Mapping the New Left Roots of Identity Poli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1, No. 4, 2000。

⑤ 参见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7, p. 9。

从挑战与不足的角度说,左翼的普遍主义阶级政治(叙事)与身份政治群体的差异政治(叙事)之间经常存在不兼容性与内在张力。除政治对抗外,身份政治的出现也是西方社会巨变与转型的后果,即民族国家以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及其运动在转型中被削弱,传统的社会规范、结构和价值大肆消散,使得发达国家的民众陷入孤独与被剥夺状态,族性依附却顺应增强。^① 急剧的社会变迁致使人们急迫寻找归附的身份集团,这一过程出现了一个“帕特森悖论”(Orlando Patterson),人们选择归附某个身份集团,但该选择以一种顽强生成并坚定持有的信念为前提,“个体除了归附于这一集团,绝没有其他选择”。^② 帕特森悖论意味着,部分身份政治群体往往持有本质主义或工具主义立场,它们从左翼吸收营养,甚至结盟,但同时会与左翼保持一定的距离。黑人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在《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及其他文献中表达其思想主张,显示他多样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以及一些和平运动领袖的思想,左翼思想只是其复杂思想的一构成部分,他还明确表示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思想。^③ 这意味着左翼普遍主义与身份政治的特殊性之间具有挥之不去的张力:左派提供的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事关全人类的政治规划,而身份政治则是基于特殊利益团体的政治。霍布斯鲍姆对此颇为担心,“自从197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种趋势——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把左派本质上当作少数群体——诸如种族、性别、性取向或有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偏好的群体,甚至由从前干脏活的产业工人阶级转变而来的经济上的少数群体及其利益联盟。这虽然可以理解,但也很危险”。^④

霍布斯鲍姆20世纪90年代的担忧并未为左翼所解决,阿肖克·库马尔等人近来重新反思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关系时,既反对两者的人为对立,又强调应回归解放政治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形态),而不是满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下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偷生”(作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延申)。在此,左翼与身份政治结合的外部挑战出现了,即英等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一系列举措打击,乃至部分瓦解了前者的结盟(后文将详细阐述)。

(二)身份—承认政治:社群主义对少数人身份政治的影响及其叙事

1. 社群主义的影响。社群主义思想对西方身份政治崛起有一定影响,这是一个基本共识。但仔细考察社群主义的影响范围,其贡献更多停留于思想与政策层面,起初不是直接作用于身份政治色彩浓厚的社会运动上,后来则有了公共政策转型。^⑤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是政治哲学界甚为熟悉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在《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一书中概括并论述了西方国家围绕少数人文化权利所产生的三波辩论,分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自由主义内部的少数群体权利辩论、差别性少数群体权利作为民族国家构建的回应下的少数民族权利争论。身份政治在权利政治维度依托于或立基于少数

① 参见[英]霍布斯鲍姆著、易晖译:《身份政治与左派》,《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参见 Orlando Patterson, "Implications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Charles Fried and Ann Dummett, eds., *Minorities: Community and Identity*,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3, pp. 28—29.

③ 参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11页。

④ [英]霍布斯鲍姆著,易晖译:《身份政治与左派》,《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⑤ 1990年,15位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集聚华盛顿,发布了新社群主义宣言《回应性社群:权利与责任》(The Responsive Community: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举起社群主义旗号,致力于推动公共道德基础的转型,其领军人物是犹太裔美国学者埃兹奥尼。新社群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和社会运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参见王俊、顾俊:《新社群主义社会思想与公共政策分析——以阿米泰·埃兹奥尼为中心》,《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0期。

人权利,而第一阶段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主要围绕个人自由是否具有优先性而展开,^①基本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但它具有间接的政策功能。^②

2. 承认政治是社群主义提供的标志性话语。加拿大学者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与德国左翼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承认政治与宪法爱国主义的辩论,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政治哲学界一场有名的辩论,^③前者为身份政治演进提供了简洁有效的话语利器——承认政治,承认政治一时间似乎成为了社群主义的标志性概念。事实上一些左翼作家,如霍耐特(Axel Honneth)、南茜·弗雷泽,也提出了自己的承认政治话语或研究纲领,但社群主义的承认政治理论确实为族裔少数人的集体权利与身份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源头。

泰勒有一段广为引用的话:不承认或错误承认……能成为一种压制的形式,把人囚禁在一种虚假的、变形的和还原的存在模式中。除了简单地缺少尊重外,它还能造成严重的创伤,让人承认残缺的自我仇恨。适当的承认不仅是一种礼貌,而且时候及其重要的需求。^④ 礼貌涉及的是道德,而重要的需求则指向了权利,也就是说,反对“不承认与错误承认”既合道德性,也有合法性。泰勒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力图在个体权利具有优先性(西方现代性的内核)的西方社会,论证承认某些集体权利属于现代性的一个部分,它是启蒙哲学家们没有明确说明但有些许指向性的内容。泰勒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分解为普遍主义的平等承认与差异政治两种类型,它们都是现代的。支撑这两种政治实践的是现代承认话语与承认思想的浮现,他将其源头主要追溯至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与康德(Immanuel Kant)的尊严观。简单说来,与传统等级社会结构相匹配是荣誉观(荣誉意味着优先权与特权),随着现代社会兴起,古老荣誉观的作用下降,而新的公民尊严观(意味着个体自主与平等)崛起并成为主流思想。这种尊严观(自主观)是道德问题的一个维度,并经过卢梭、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与康德等思想大家的论证阐发而日渐清晰,其中赫尔德与康德将差异赋予道德上的含义。这一思想演进的核心主张是一种“本真性理想”——忠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的理想,这意味着我们能否得到道德拯救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发现与自身本真的道德联系。^⑤ 在泰勒看来,集体认同与个体认同都是现代性的体现,是权利的不同维度,是现代本真理想的两个分支,是西方现代社会中两种包含张力但又有其共同源头的两种自由主义主张所看重的内容。泰勒的这一论证业已将社群主义纳入扩大版本的自由主义范畴之下,这一点与柏林(Isaiah Berlin)的多元自由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3. 社群主义与左翼承认政治的差异。社群主义与左翼思想家的承认政治概念均揭示了不承认或错误承认的压制和创伤性后果,但接下来两者的走势却颇为不同,即左翼作家将承认政

^① 详细论述参见[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② 如金里卡所论,后面两阶段辩论依托于第一阶段的辩论,它一方面促使部分自由主义思想家部分修正其思想,进而与社群主义者形成一些交叉共识;另一方面,第三阶段的辩论已经弱化政治哲学色彩,进入并聚焦于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少数人权利的公共政策范畴。

^③ 国内学界对这一辩论也很关注,有学者将辩论各方主要文献编成文集出版,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④ 参见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

^⑤ 参见[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第293—294页。

治导向了解放政治,社群主义者只追求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获取集体权利,而非结构性改造。南茜·弗雷泽为此做对比,她强调了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肯定的再分配政治与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肯定的承认政治相契合,而左翼思想家的方案与此不同。

(三)身份一容纳政治:自由主义对少数人身份政治的回应与阐释

1. 自由主义光谱中包含容纳身份政治要素与思想基础。弗雷泽的比较及泰勒扩大版本的自由主义理论均指明,在阐述身份政治的动力时,离不开自由主义谱系。自由主义思想谱系非常复杂,虽然我们能够发现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关注、不重视少数人权利与身份政治议题,但在自由主义内部,柏林的多元自由主义思想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均能为差异性身份政治提供一些解释空间。此外,力图调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威尔·金里卡便以“自由多元文化主义”著称,他旨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形成桥梁,让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有机构成部分,身份政治是其中的一个主题。^①辛格(Beth Singer)等人也在调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②因此虽然社群主义有时具有保守主义的些许特质,但也具有完善自由主义的意涵。

2. 新自由主义对身份政治的容纳策略及其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思想与制度实践方面展现了容纳策略。换言之,新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对接所体现的特色是容纳政治,它既是对左翼思想、社群主义思想的回应,也是对身份政治实践的回应,这种被动型回应也属于民主和治理范畴。起初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所涵盖的公共政策回应,其后是冷战结束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回应。

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化解阶级政治及其与身份政治结盟的呢?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举措是制造业离岸外包,将大企业重组为小公司,公共服务私有化,减税并收缩政府,日常生活金融化。这些举措造成多重后果:在阶级政治方面,破坏传统产业,从而使工人阶级原子化和工会崩散;在身份政治方面,离间工会与身份政治群体,防止二者结盟,^③并向两者伸出胡萝卜从而降低工会与身份政治群体。^④对现有体制的破解性。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文化和身份政治进行再叙事,使得前者成为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⑤后者则成为阿肖克·库马尔等人所说的新自

^① 艾森伯格与金里卡主编的《公共领域中的身份政治》一书是2006年女王大学所策划的EDG(族群性与民主治理)系列的一份子。他们主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族群共同体形成、政治动员、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其二,在多族群社会为了发展民主对国家而言合适的制度战略和政策是什么?其三,在何种程度上国际共同体能够有利地解决族族群冲突?其四,在形成或评估治理多样性过程中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公正与民主规范原则?参见Avigail Eisenberg and Will Kymlicka, "Bringing Institutions Back In: How Public Institutions Assess Identity," in Avigail Eisenberg and Will Kymlicka, eds.,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Public Realm*, Preface.

^② Beth J. Singer, *Pragmatism, Right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8。该书中的第九章名为“调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Reconciling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③ 譬如,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与英国工会组织展开复合博弈。1985年英国全国矿工罢工失败为标志,工人阶级活动与左倾意识形态逐渐淡出衰退。在种族移民议题上,代表白人劳工阶层的工会与企业管理层(资方)勾结,限制移民以获得更好晋升机会,因而导致少数族群与白人劳工阶层联合破裂。少数族群沿着阶级展开动员的方式开始转变为沿着族性动员开展。

^④ 关心少数群体成为政客们的口头禅。马克·里拉新作开篇的引言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1985年)的话,“我们必须明白,作为一个关心劳工的政党和作为一个劳工党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关心女性的政党和作为女性政党是有区别的。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个关心少数民族的政党,而不是成为少数民族政党。我们首先是公民”。参见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Epigraph, 2017。

^⑤ 参见[美]保罗·梅森:《克服对自由的恐惧》, [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孙柏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7—152页。

由主义理性的一种形态；身份政治如何融入新自由主义理性思想？新自由主义理性的标志是竞争，也是市场的根本原则。在再分配与承认层面，新自由主义允许族群等身份群体参与，但它是边缘性角色。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1%的人掌握99%的资源，但只要女性、少数民族和LGBT人群有其比例代表，则资本主义仍然被认为是完美的。^①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以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的政策为标志，它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联盟，即为取代由制造业个人联合会、非裔美国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结成的新政联盟(the New Deal Coalition)。克林顿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郊区居民、新社会运动和年轻人构成的联盟，通过拥抱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妇女权利来宣扬他们现代的、进步的善意。执政的自由主义者思考的是，如何将新社会运动势力(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LGBTQ权利)，与高端精英势力(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结盟，前者为后者赋予更多感召力。^②这种容纳身份政治的举措为当前美国民主党所继承，自由主义学者马克·里拉也在反思中证明了这种结盟，并认为自由派在身份政治方面走过了头。他对比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网站主页，前者呈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文件，而在民主党的主页上找不到这类文件。“相反，当你滚动到底部，你会发现一个名为‘人’的链接列表，每个链接都会带你进入一个专门针对不同群体和身份的页面：女性，西班牙裔，“美国少数族裔”，LGBT群体，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共有十七个这样的群体和十七条独立的信息”。^③

3. 新自由主义危机下容纳身份政治引发的新争议。新自由主义以理性竞争与容纳的方式对待少数人身份政治自有其功效，但新自由主义有自身的缺陷，随着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少数人身份政治与西方民主的关系再度成为自由主义内外的热点性论题。2018年前后，福山对身份政治与民主的关系做出了新诊断。自由民主国家致力于确保人们在思想市场(尤其是政治领域)中什么都能说的权利，但对身份认同的过分关注与公民对话的需要之间产生了冲突。身份认同政治使各个小群体内在自我的情感世界优先于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理性审视，它更看重自我的观点而非理性协商的过程。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需要适应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由于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多样化，这要求主流社会对以前忽视的群体给予承认，但这意味着被他们所取代的群体地位下降，由此导致了怨恨政治和反对政治。集体身份认同因此愈发狭隘，社会团结和整体利益可能因此受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和失序。福山的这种看法引发了学政各界的热议与回应。^④

民主党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Y. Abrams)坚称身份政治能够加强民主。其核心观点是，近十年来美国选举政治中有几个新特点，如选民年轻化、族群多样化、选举深受社交媒体影响，这些新特点导致美国边缘群体影响力增加。对美国民主体制中的积极分子和政治挑

^① 参见 Ashok Kumar, Adam Elliott—Cooper, Shruti Iyer and Dalia Gebri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y Pol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6, No. 2, 2018.

^② 参见[美]南茜·弗雷泽：《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孙柏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72—73页。

^③ 参见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Harper, 2017, p. 12.

^④ 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2019年第2期上有一个“新民族主义”的特别专题，同时也刊载了有关身份政治的辩论性文章。一些学者与福山2018年“反对身份政治”的新作展开对话，主题之一是身份政治与民主的关系，详细内容参见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2, 2019.

战者而言,需要熟稔这些要素(特别是过去居于主导群体习惯于压制身份政治),并将其转化为民主正义的工具。美国治理多元文化必须面对包含身份政治在内的嘈杂而有活力的声音,接受身份政治的过程虽然不乏痛苦、令人不快,但它能够促使美国人成长为一个整体。^①

约翰·塞德斯(John Sides)、迈克尔·泰斯特(Michael Tester)和林恩·瓦夫雷克(Lynn Vavreck)等整体上也认为身份政治没有导致民主的崩溃,他们重点驳斥了福山提出的美国人身份应该建立在个体性公民身份上,即所谓信条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在他们看来,身份政治与信条式国家认同之关系并不必然紧张,两者是可以兼容而非二元对立的,两者兼容是遵循民主原则的、通往多样化的国家民族(a diverse nation)的唯一路径。^②

福山对此做了回应,他认为质疑者聚焦于2018年其所发表的论文(那只是其《身份》一书中的部分)可能造成部分误解。至于身份政治与民主的关系,他做了一个身份政治究竟是一种选举策略还是统治方式问题的区分,也就是说,他认为当前美国共和党的一些身份政治体现在选举策略层面,而并没有将其作为治理的方式加以推行。^③其言外之意是,身份政治在形式与内容上并不统一,流于工具性。显然,这一有关身份政治与民主关系的辩论,只是较长时间内两者互动进程中一个新的辩论延展而已,^④但福山从冷战结束至今对自由主义的认知却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这确实是西方危机的一个表征。^⑤

(四)身份一对决政治:右翼保守主义与白人民粹主义的身份逻辑和叙事

在欧美多数人身份政治的勃兴过程中,保守主义(在精英层面表现突出)与民粹主义(在社会底层表现突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进而形成了少数人身份政治与多数人身份政治对决的新局面,并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维度,且与政党政治极化相互呼应。

1. 保守主义的忧虑与批评。西方保守主义思潮有其内在脉络,而且是一种复杂的思想谱系,身份政治只是其关注、表达的一个维度而已,下文仅从几个要点上加以勾勒。

其一,保守主义在批评多元文化主义进程中体现其对少数人身份政治的不满。他们“指责多元文化主义过于支持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从而削弱了原有的本土文化。他们通常将文化冲突描述为一场零和战争,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只会有利于偏狭的、反现代的、反民主的少数群体,而且还会将多数群体斥责为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⑥

其二,亨廷顿等保守主义思想家对少数人身份政治与多数人身份政治的对决有一些预见性。在国内政治层面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亨廷顿并未就身份政治理论大书特书,但他的很多观点具有着身份政治因素。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亨廷顿指出,很多美国人受全球化和多元文

① 参见 Stacey Y. Abrams, "Identity Politics Strengthens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2, 2019.

② 参见 John Sides, Michael Tester and Lynn Vavreck, "Identity Politics Can Lead to Progress,"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2, 2019。此外,理查森(Jennifer A. Richeson)也认为,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仅靠福山所说的信条身份是不够的,她希望将公民式身份与群体身份有机结合起来,参见 Jennifer A. Richeson, "A Creedal Identity Is Not Enough",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2, 2019。

③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Fukuyama Replies,"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2, 2019。

④ 代表性作品有:James Tully, *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celyn Maclure,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t an Impasse? Identity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1, 2003。

⑤ 冷战结束后,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以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以胜利者的姿态一统天下;近年有关“政治秩序起源”以及“身份政治”的探讨,显示其对西方民主与自由主义的担忧,近期新冠肺炎背景下福山更是提出“新自由主义已死”的论断,福山三十年间学术观点随西方社会变迁出现颠覆性变化。

⑥ 恩佐·波伦科著、郭莲译:《多元文化主义:西方社会有关多元文化的争论概述》,《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4期。

化主义的蛊惑,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却因此贬低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在美国国内,促进移民同化的因素式微,越来越多的移民保持双重的国籍、认同和忠诚。这其中,拉美裔移民人数众多,再加上其超高的出生率,美国的拉美化趋势明显。亨廷顿进一步指出,若长期如此,美国可能变成一个分成两权的、通行两种全国性语言的盎格鲁—拉美社会,处于美国特性核心地位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将受到威胁,共同的国家认同则会出现消损,美国因此将面临巴尔干化的危险。亨廷顿在此部书的序言中做了开宗明义的自白:“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样两种身份写作本书……可是,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所以,他对于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受到其爱国心的影响”,^①但其爱国心是建立在所谓美国特性这一保守主义立场之上,这一立场本身包含了思想层面身份政治的对抗。小布什政府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诸多政策举措,一定程度上是在回应亨廷顿的警示。

其三,在近年日益悲观的氛围下,一些欧洲保守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宣言,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身份政治的对抗。2017年,部分欧洲保守主义者提出了其文化宣言——《巴黎声明: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这也是保守主义身份政治思想的体现。该宣言反对“虚假的欧洲”,强调捍卫并重建“真实的欧洲”。在“立”的层面,它强调民族国家是欧洲的基石,强调欧洲的基督教根基与古典根基,认为民粹主义有合理意义,认为一种恰当的等级制有益于社会福祉。在“破”的层面,它反对虚假的自由观,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行不通,反对技术官僚暴政,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移民与种族问题上,它甚至直接提出“移民没有同化就是殖民化,这必须被拒绝”之类引人争议的表达。^②“原住民+民粹主义+基督教古典传统文化”对抗“外来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的轮廓跃然纸上。

2. 白人民粹主义叙事与安全化逻辑。白人身份政治勃兴的突出表现是对外群体的歧视、敌意、仇恨,以及群体内部的团结、偏好上升,白人群体的政治意义彰显。^③在社会心理层面,它体现为主体种族(族群)的焦虑、愤怒与恐惧,这是群体安全感下降的表征。民权运动大幕开启之后,白人主导优势犹存,但制度性歧视逐渐无法公开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多数白人虽承认社会曾给予白人优势地位,但他们同时认为,黑人等有色人种获得补偿照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白人身份红利日渐萎缩的过程,肯定性行动早已矫枉过正,白人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遭遇了“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在他们眼里,少数人权利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简言之,很多白人觉得白人群体已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种受伤害感在那些教育水平偏低、专业技能不足、身处低端岗位的中下层白人中尤其明显。白人劳工阶级权力的残余及其可感知的丧失之间的张力,导致了他们激进化的现象。^④白人劳工阶级选民之所以为特朗普所吸引,不仅仅是因为他重新激活了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还在于他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前言部分。

② 参见The Paris Statement—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 October 7, 2017, <https://thetrueeurope.eu/>。

③ 前者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并有所阐释,而后者近年来比较突出,美国学者阿什利·贾迪纳(Ashley Jardina)对后者做出了杰出的论证。在贾迪纳看来,原来美国学术界的共识是,白人基本上不考虑他们的白人身份——至少不是以一种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但白人身份政治的崛起改变了这一格局。参见 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UK & New York,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④ 参见 Justin Gest, *The New Minority: White 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an Age of Im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

带给白人劳工阶级一种对过去似曾相识的荣光的怀念。^① 作为多数且居主导地位的白人,为何群体不安全感或安全困境会飙升呢,且与身份政治关联起来呢?

其一,欧美国家人口结构变化是其不安全感增强的前提与重要诱因。亨廷顿对美国白人多数地位丧失的担忧已为学界所熟知,近期数据显示,2043年美国白人可能失去数量意义上多数人的地位,“白人少数民族”的意向从国家建设到社会心理层面均是巨大的议题与挑战。近二三十年来,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美国,再加上部分移民群体的生育率远高于白人群体,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自1965年美国移民法取代国家配额制度以来,美国的移民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在2016年达到了创纪录的437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3.5%;而在1970年,移民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的4.7%。^② 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份报告预测,到2050年,美国非拉美裔白人人口将由2005年占总人口的67%降为47%,拉美裔人口将从2005年的14%上升为2050年的29%,黑人在2050年占比将与2005年大致相同,维持在13%的水平,亚裔在2050年将由2005年的5%上升为9%。^③ 西欧国家大量移民到来也带来了类似的安全担忧。在东欧一些国家,外来移民人口比较少,本不应该在此方面有突出表现。但近年来,匈牙利、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抬头,他们排斥移民,“移民威胁论”日渐浓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口结构有关。近三十年来,这些国家多数属于人口输出国,国内人口呈现递减趋势(参见表1)。若有大量中东、北非等地难民移入,其种族文化结构也将急剧变化,“文明冲突”与“移民威胁”的想象提前到来了。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东欧国家人口数量的变化

|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8年 |
|------|------------|------------|------------|------------|
| 保加利亚 | 8,718,289 | 8,170,172 | 7,395,599 | 7,024,216 |
| 拉脱维亚 | 2,663,151 | 2,367,550 | 2,097,555 | 1,926,542 |
| 摩尔多瓦 | 3,696,000 | 3,639,592 | 3,562,045 | 3,545,883 |
| 乌克兰 | 51,892,000 | 49,175,848 | 45,870,700 | 44,622,516 |
| 克罗地亚 | 4,777,368 | 4,468,302 | 4,295,427 | 4,089,400 |
| 立陶宛 | 3,697,838 | 3,499,536 | 3,097,282 | 2,789,533 |
| 罗马尼亚 | 23,201,835 | 22,442,971 | 20,246,871 | 19,473,936 |
| 塞尔维亚 | 7,586,000 | 7,516,346 | 7,291,436 | 6,982,084 |
| 波兰 | 38,110,782 | 38,258,629 | 38,042,794 | 37,978,548 |
| 匈牙利 | 10,373,988 | 10,210,971 | 10,000,023 | 9,768,785 |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官网各国人口数据整理。

^① 参见 Fredrick C. Harris and Robert C. Lieberman, *The Return of Racism? Race and Inequality After Charlottesville*, August 21,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7-08-21/return-racism?pgtype=hpg>.

^② 参见 Jynnah Radford, *Key Findings about U. S. Immigrants*, June 7,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6/17/key-findings-about-u-s-immigrants>.

^③ 参见 Jeffrey S. Passel and D'Vera Cohn, *U. 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 - 2050*,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1, 2008, <https://www.pewhispanic.org/2008/02/11/us-population-projections-2005-2050>.

其二,在新自由主义危机背景下,白人的不安全感更容易归因于少数人及其身份政治。少数人身份政治意味着,一国人口结构的种族、族群要素要与涉及身份群体文化承认、社会福利(再分配政策)、政治代表权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其逻辑是增加在种族和族群身份维度上配置资源、构建秩序的力度。当少数人整体规模偏小,再分配比例偏低时,多数人对这一身份政治逻辑容易接纳,新自由主义的容纳逻辑便是如此。但当新自由主义运行本身出现危机,且人口结构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时,部分率先受损的多数人的身份危机意识勃发,见诸于当下英美则是底层白人和部分中产白人的恐惧,因为他们在就业与阶层地位方面面临直接与间接的挑战。美国的外来移民中,拉美裔移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多从事低端行业,与白人底层劳工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此外,外来移民还挤占了美国国内有限的福利和教育资源,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这让白人劳工阶级异常不满。尽管在归因上可指向技术挑战、移民挑战、国家治理结构困境,但移民等少数人群体更容易成为“替罪羊”。

其三,部分白人地位衰退导致恐惧、焦虑、怨憎的扩大再生产,去文明化与权威人格抬头,身份政治对决引发的社会安全困境在扩大。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将怨憎视为理解欧美国家在道德、情绪与政治方面分崩离析现状的核心概念,也是阐述多数人身份政治的关键性概念,^①这与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对民族主义的心理研究和福山最近对身份政治的阐述所见略同。弥漫的怨憎和恐惧螺旋上升,在思维和行为方面可能诱发去文明化和权威人格抬头。去文明化现象目前“不仅出现在欧美中低阶层,也出现在精英人士之中,在中等学历、中等收入的中年男性中最为突出”。地位丧失导致他们通过消极归类其他群体寻求平衡,这是“怨憎、负面情绪、身份认同和阴谋论的催化剂,也是权威人格的特征”。^②

四、欧美身份政治的评价

(一)身份政治的积极作用

应该承认,在弱势群体和边缘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中,身份政治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身份政治最初是作为一种对不公正对待的道德控诉和政治弥补现象而出现,它有助于反思当下主流政治文化的霸权色彩,扭转现实社会与政治中的歧视和不公状况,保护少数群体正当的政治权利、社会利益和道德自尊,实现普遍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③

从民主政治角度来看,身份政治的兴起一度推进了欧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现代西方是以公民个体民主实践为主流,但有其不足,而身份政治提供了一种集体民主协商形式,是对历史与现实不平等民主解决方式,虽然它具有左翼或后现代印痕。从时间上看,身份政治开始兴起的时期也是后现代主义日益走向兴盛的时期。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审视,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宏观政治包含着显见的支配关系,藉此谋求“求同于己”;身份政治则拒斥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崇尚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权力形式,寻求“存异于己”。在身份政治兴起的初

^① 参见[印度]潘卡·米什拉:《怨憎时代的政治学,启蒙的黑暗遗产》,[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孙柏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67—186页。

^② 参见[德]奥利弗·纳赫特韦:《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孙柏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216—217页。

^③ 参见马涛:《身份政治与当代西方民主的危机》,《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

始阶段,诉诸身份政治的多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从被支配者或反支配者的角度来看,在差异关系中处在边缘或弱势的地位的他者亦很重要。他者不仅不应被漠视,而且还要主动发声,这一点恰是后现代认同政治所鼓吹的。^①综合看来,这一时期的身份政治与民主化进程是相互促进的,身份政治的风生水起与欧美社会普选制的真正实现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从经济与文化角度审视,身份政治的兴起一度缓和了欧美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对立,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得以大行其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很多劳工阶级成员都迈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福利政策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多数人的生活(至少在物质层面)比他们的前辈要好得多,人们的寿命普遍变得更长。再加上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对抗背后的话语争夺,欧美社会对“阶级”一词时常保持警惕态度。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容纳力和容纳度都明显上升,传统以经济/阶级为基础的纵向不平等议题让位于以种族、文化群体为根基的横向不平等议题。很多人认为,政治议题已转入新的社会群体中,分散于种族认同、性别认同或环境问题等议题中。在“政治市场”中,各派别的政治人物倾向于吸引最广泛的选民而不是特定的阶级,不平等被定义为社会问题而非阶级问题。^②

(二)身份政治局限性与危险

首先,身份政治包含了可能助长等级制、束缚个人自由等消极因素。身份政治将个体视为群体的附庸,迫使个体放弃独立性与自我反思,限制了个人自由的实现。譬如,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份政治运动近来在美国大行其道。他们将非洲裔美国人的艰难处境归咎于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种族主义问题,但却缺乏对非洲裔美国人自身问题的反思,也无法解释为何同为少数族裔,且同样面临种族歧视问题亚裔群体在美国的不同处境。在欧美国家中,族群移民等少数人身份政治,主要涉及历史上因身份遭压迫剥夺而产生的补偿政治,承认身份群体重要性的平权政治以及身份群体的特定文化权利保障。其正当性整体上得到承认,但少数人身份权益不乏传统要素。对于诸如穆斯林移民(族裔)群体,部分欧美人士认为其身份政治包含了与现代主流价值相悖的要素,对该群体内的女性等弱势群体的自由选择权反而是一种伤害。

其次,身份政治可能固化单一身份,导致身份排他,乃至身份单一主义。每个人都有诸多身份(或身份交叉),但在身份政治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单一身份的固化、僵化、本质主义化的幻想性危险。阿玛蒂亚·森甚至将身份政治与暴力冲突结合起来,认为全球范围内潜在的冲突主要根源之一源自这样的假设:即可以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单一身份支配地位的信念使得暴力在全球一触即发。在森看来,文明冲突论与原教旨主义均有“身份单一论”的倾向。他论述指出:所谓身份单一主义论,也即多元文化单一主义,是把自己首先视作特定社群、特定宗教族裔的成员,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成员身份才能成为一个XX人;如果多元文化主义坚持人的身份认同必须由他的社群或宗教背景来界定,而忽视一个人所有的其他归属(语言、阶级以及政治观点和社会角色相关的社会关系等),并赋予宗教或传统身份自动的优先性,那么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道德和社会诉求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文明冲突论”倾向于将宗教

^① 参见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6页。

^② 参见Wendy Bottero,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Kjartan Páll Sveinsson, ed., *Who Cares about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London: The Runnymede Trust, 2009, pp. 11-12.

差别作为区分不同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因而具有重大缺陷。^①

再次,身份政治导致欧美社会呈现碎片化趋势,削弱了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国家认同。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公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将社会成员从“集群化”状态打碎到“原子化”的境地,继而通过“国族建构”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②这种普遍主义的政治模式强调同质性、忽视异质性,强调国家认同、忽视族裔认同,曾一度盛行于世。但后来的诸多事实表明,这一模式亦问题多多,因此备受多元文化主义者、承认政治支持者的诟病,这也是身份政治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份政治的追求者越来越陷于自身的狭隘利益,却忽视了超越其上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共同愿景。这种身份认同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同质团体甚至试图以特殊主义的方式,将其主张和意志上升为普遍主义上的社会意识,建构凌驾于公民身份认同之上的小团体认同,因而形成了所谓的“新部落主义”。^③这实质上是一种“特权化”的行为逻辑,致使“原子化”的个体重新“集群化”。少数人身份政治与多数人身份政治的对决使欧美国家沿着身份认同而撕裂,身份认同“部落主义”趋势强化,进而导致了社会的“碎片化”,使国家认同被削弱,民主原则遭到巨大破坏,日趋严厉的极权政治和极端政治行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④

又次,包含工具性、排他性的身份政治可能助长极权对抗,^⑤诱发民粹主义极端行为,进而成为西方(治理)危机的重要构成部分或根源之一。身份政治演进过程中身份的排他性、工具性^⑥特质屡见不鲜,加上意识形态政治卷入其中,在一定条件下会激化恶性对抗与身份政治激进化等不良后果。西方早期的身份政治更多聚焦于以在种族、族群、性别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但对于其在右翼群体中的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左翼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国家的左翼已不再关注创造更大的经济平等,而是致力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女性和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等边缘群体的利益。左翼践行身份政治以及新自由主义容纳身份政治激发了右翼的对抗性身份政治,刺激了右翼对传统身份认同的维护,这种身份认同通常与种族、族裔或宗教相关。右翼人士从左翼借来了同样套路的语言和框架,他们像左翼人士一样玩冤情游戏。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身份政治成为人们看待大多数社会问题的视角。并且,身份政治越来越具有后现代主义的

① 参见[印度]阿玛蒂亚·森著,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身份与暴力》,第134—137,60页。

② 陈建樾:《认同与承认——基于西方相关政治理论的思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③ 关于身份政治导致部落主义的讨论,参见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5, 2018;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④ 发达国家右翼白人极端分子近年在挪威、德国、美国、新西兰等地均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事件,一些事件制造者还在互联网上直播其恐怖行动,发表恐怖主义宣言。可以说,白人极右势力的仇恨言论在互联网上颇为流行、传播很广,这彰显了欧美国家多数人身份政治的极端性。关于自媒体上西方极右势力话语的跨国化之呈现与讨论,参见Caterina Froio and Bharath Ganesh, “The Transnationalisation of Far Right Discourse on Twitter: Issues and Actors That Cross Borders in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European Societies*, 2019, Vol. 21, No. 4。

⑤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很早就预见到了身份政治所蕴含的对抗结构和意义。他指出,在网络社会,人们仍然遵循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统治—反抗的辩证规律: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反抗,哪里也就有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竞争性主张和方案。身份认同是各种方案的内核性因素,身份认同建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合法性建构、抗拒式建构和规划性建构。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⑥ 所谓身份政治的工具性是指,由于可能被精英政治利用,或对文化(身份)政治化的边界认识不清晰,导致偏离其追求、承认、正义、公正的初衷(合法性上的名实分离的危险)。

表演政治的特点,成为社会精英和政治领袖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或政治动员的工具。美国今天的政治人物为保持政治存在,都不得不卷入追求和强调身份认同的政治洪流当中。^①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2020年欧美国家新冠疫情持续走高,使得其种族问题、移民问题与疫情叠加在一起,这是身份政治演进中面临的新局面与新挑战。2020年5月底以来,因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跪压”致死而引发的席卷美国的抗议与骚乱,“弗洛伊德事件”使本就紧张的美国种族矛盾火上浇油,“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再度燃遍美国,并且有走向极端化的趋势。“黑人的命也是命”具有明显的身份政治的特征,其活动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复兴(也有人在街头政治中针锋相对地提出“白人的命也是命”),从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部落化”和极化进程。在欧洲,当前身份政治的极端化主要表现在本土右翼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但其激烈化程度尚不及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危机与反全球化思潮兴起的背景下,欧美国家极端化的身份政治运动仍将高位运行。在国际层面,欧美国家新的身份政治还与日益明显的国家民族主义相结合,体现出了反全球化、逆多边主义之态势,这不利于区域主义与全球命运共同体事业之推进。

五、结 论

特定时空下个人的身份具有多样性、流动性,而特定身份往往与资源配置、社会地位、归属感息息相关,故不同身份群体主动介入或被动卷入现代政治进程实属必然。从欧美国家民族问题的角度说,身份政治起初主要围绕少数人——族群、种族、移民等群体而展开,其后扩大到多数人,它引发了政府、政党等政治行为体与各种身份群体之间展开多方复合性博弈。它跨越了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不同时段,能够与诸多意识形态——主要是左翼思想、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进而形成了复杂的身份政治生态,身份解放政治、身份承认政治、身份容纳政治与身份对决政治于其间突显。在个体主义具有优先性的现代西方社会,身份政治为不同视域下的集体主义提供了一定的腾挪空间,这是西方现代性道路必然要面对的知识路径与实践维度。

西方身份政治议题多样、线索多元,但演进过程中不乏时段共性和整体脉络,其整体线索是从少数人身份政治分阶段勃兴(突出表现在种族问题、移民问题上)到多数人身份政治崛起,进而演化为少数人身份政治与多数人身份政治的对决状态。面对这一演进,如何深化认知,笔者以为:(1)我们必须在传统的身份政治的二维解读——社会运动与哲学讨论——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地添加国家治理的解读环节,它既可能是治理中的资源,有可能成为治理中的麻烦与困局;(2)在西方身份政治演进与国家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或显或隐的群体身份“阶级化”“权利化”“安全化”“意识形态化”逻辑与话语叙事线索,每一个线索都有一定的自主性,且值得进一步挖掘;(3)西方身份政治的演进更迭,既有其积极性,也不乏凶险与局限。从早期的竞争性博弈迈向最近的尖锐对决,这既是身份政治生态不平衡一再平衡趋势中的一个新阶段,也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与全球化危机背景下西方“启蒙的黑暗遗产”的突显。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参见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